

省化机厂易主风波始末

大聚焦

文/夏炎

题记

“企业改革必须充分依靠广大职工的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先充分征求职工的意见，按规定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坚决防止少数个人借领导人之名，把企业兼并或拍卖了，职工还蒙在鼓里的极端错误现象。这不仅仅是一个程序、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企业是否坚定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企业改革的成败和社会的稳定。”

——摘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在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接管起风波

1997年5月20日早晨，陕西省化工机械厂福利区门口来了一群人，又是东张西望，又是丈量土地，他们的举动，被早已站在院里的职工“捕捉”到了，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化工厂沸腾了。“化工厂被卖了，来新主人了。”不久，职工们老老少少把这群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得知接收者是西安亨通公司——一个私营企业时，职工们议论纷纷，群情激愤，推搡着这群人。这群人中的一个头头模样的人，生怕闹出乱子，便招呼这群人灰溜溜走了。

一队警察听到“报案”后，急匆匆地赶来了，当听完职工们的解释后，警察也深表同情，认为是厂内的事，便一拥而散了。

一时间，厂里议论纷纷。有的说，厂子破产是厂长为了逃债；有的说，亨通公司是皮包公司，等等。过了两天，亨通公司正式宣布化工厂是公司属下的经济实体，并公布了第一个职工安置方案。

陕西化工机械厂位于西安市南郊八里村二街二处，整个厂区和福利区占地面积达70余亩，环境优美，尤其是厂福利区毗邻交通要道，是发展商业的良好地段。化工厂曾经是陕西鼓风机厂的附属企业，后独立，专门生产鼓风机配件。改革开放之初，产品畅销省内外。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拥有职工800余人，家属千余人，固定资产上亿元的中型企业。90年代后，由于产品换代缓慢，跟不上市场发展步伐，产品滞销，又加上国有企业共同的问题：管理不力，大小“耗子”横行无忌……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攻之下，偌大的一个中型企业就被整得千疮百孔，生产处于瘫痪状态，还倒欠外债达2700多万元。

原任厂长在主管上级机关冶金机电局的默许下，以资不抵债的名义申请化工机械厂破产。1996年9月18日，法院正式批准化工机械厂破产。西安产权交易中心同年10月25日在《西安日报》上刊出化工厂拍卖标的。

企业破产后，职工由于长期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许多家庭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中，连吃穿都发愁。由于厂里没有钱支付水、电等费用，职工们的日常生活、用电都发生了困难。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职工们甚至连电视也看不到，这是因为厂里无钱支付电视费；许多在外上学的化工厂子弟被勒令停学，也是因为厂里无钱交纳赞助费和借读费……据该厂不少职工因为破产后无收入生活困难，一日三餐白开水就凑，重病不能就医……面对这种种困难，一些对原厂感情深的老职工都不禁流下了眼泪，他们说：“破产对国家、对社会、对自己，都没有好处，我们为什么要破产呢？”

在破产期间，也曾有许多化工厂职工四处奔走，极力想挽回破产的败局。在1995年和1996年期间，先后有两家国有企业想兼并化工厂，但由于福利区所属不让，双方没有洽谈好而中途流产。化工厂职工们的希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飘荡在风雨之中，终于在亨通公司接管时激起了风波。职工们在厂门口贴了各种标语和横幅，并且针对亨通公司的安置方案提出了许多质疑，坚决抵制亨通进厂。一时间，厂门口成了职工发表言论的“民主墙”，一会是职工代表的抗议书，一会又是亨通的“告全体职工书”。据一些职工回忆说，当时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亨通公司不敢在白天撕毁职工的抗议书，常常夜深人静时撕下职工的抗议书，再贴回自己的告示。

职工们迅速地成立了组织，推选了代表，大家你十元，我二十元地给这些代表凑钱作进一步上访的准备。从1997年6月—12月，他们一直在上访，找过主管机关冶金机电局，也找过省委，并且多次在市政府门前集会。亨通公司当时连西安公安八处和雁塔分局的警察都调动起来了（笔者猜测），只是在职工保证不堵塞交通，不上街的情况下，警察才离去。据几位老职工讲，亨通公司尽管也作了些努力，给他们发了一部分工资，暂时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但是总难以平息职工心中的疑问，职工代表们依然频频出现在上访途中，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职工们竟然喊出了“亨通公司滚出去，实行股份制”的口号。

化工厂的新主人

西安亨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日期为1996年9月12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出资来源主要由光大科技公司提供，可以说亨通公司是借“光大”公司之腹怀胎所生。亨通公司拟定的经营范围从电子产品到中介服务达37项之多。法人徐伟(女)(又名徐艳)，亨通公司怀抱借腹的“光大科技公司”全称西安光大科技贸易国际广告公司，法人：赵恒，1995年11月16日变更为徐伟。注册资金268万元。性质全民。经营范围：电子产品、计算机、机械设备等。发照日期：1994年12月26日。

两公司的发照机关均为西安市工商局。1997年5月15日西安市政府办公厅专题会议决定：“同意西安亨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按国家《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和省化机厂破产清算小组省化机厂破产清算[1997]号文件精神，以2494.26万元接收省化机厂工业区和全部职工。具体手续由西安市产权交易中心负责办理。同意西安亨通公司以600万元(其中，向市国资局交300万元；向市土地局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300万元)一次性买断省化机厂福利区；西安市亨通公司在接收合同签订后，务必尽快将原省化机厂所欠市工商银行100万元债务付到位。”可早在1997年5月4日，西安亨通公司已在《西安晚报》上打出招聘广告，广告称：“西安亨通自创立以来，顺应市场大潮，商贸与实业并举，已发展为融房地产、贸易、医药、科技、广告、国际展览，实业经营为一体的公司，拥有总资产一亿五千万元。”这一亿五千万元似乎包括省化机厂。

1998年元月13日，笔者一行2人来到了西安亨通公司的办公地点西安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厦11层，没有见到法人代表徐伟，接待者是亨通公司的现任董事长陈卓如。这位董事长对这场接收风波早有所了解，他对记者说，亨通公司对化工厂的接收是符合党的十五大精神，也是按照国家法律程序办的，是得到各级政府批准的。在接收化工厂后，曾先后发了两次“告全体职工书”，详尽地发布了职工安置方案……“我们也理解广大职工在企业破产后生活困难，接收条件是非常优惠的，及时给大家发了部分工资，亨通还给职工及时解决了水、电等迫在眉睫的困难……”当谈到有些职工对接收不能理解时，他也承认这是因为“行政行为”所造成的麻烦，但是绝大多数职工还是普遍赞同接收的，我们有实力，也一定能把化工厂的生产恢复，搞好！

职工如是说

1997年12月，寒风凛冽的一天，笔者在陕西西工报社会议室采访了化工厂的几位职工代表。同时在场的还有《陕西工人报》、《华商报》、《各界导报》、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几位记者。

化工厂的职工代表一共有5名，标准的中国普通工人形象，衣着朴素，虽然来前曾经极力收拾整齐，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满脸的沧桑和沦为城市贫民的寒酸。他们一听说记者来，就满脸忧愁，其中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职工——苦呀！”

这五名职工是原厂办的刘胜利，行政科的李玉平，原厂长李金奇，高级工程师罗永祥和原厂里的一名会计。他们说道，当企业破产后，职工的心情可谓“悲喜交加”，悲的是，从此赖以生存的“家”没有了；喜的是，可望今后有一条出路。可谁知道，竟然来了个亨通公司，职工们的最后一点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你亨通公司，一不召开职代会，二不给全厂工人打招呼，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进来，算个啥呢？厂子是我们职工的，为什么不问问我们职工商量？你亨通公司是个什么样子的公司？有没有这个实力？我们并不了解……”

“亨通公司在告职工书中称，亨通公司是全民性质的企业，可是为什么不敢把营业执照给广大职工看，不敢向我们职工交待清楚的性质、资金情况、经营范围、经营状况等……”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或大声责问，或细声细语。记者听出来，在他们的眼里，亨通公司根本就是一个皮包公司，无力安置职工也无实力搞好生产，“主要是看中我们厂福利区位置好！”

“到什么时候地皮一炒，溜之大吉，我们职工找谁去？”

“我们几个都是在厂里工作了几十年，眼睁睁看着化工厂发展壮大的，我们又怎么忍心看着它垮在他们手里！”他们给记者看了给省领导的上访书，职工的签名有517名，还给记者看了亨通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的复印件。据他们讲，亨通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李金奇，而且用的是化名。“为什么要用化名？”国家公务员为何违规经商，且从哪里来那么多资金？”他们反映，这段时间，亨通公司频频更换法人代表，岂不是欲盖弥彰吗？

他们又提出质疑，既然亨通公司称自己靠西安光大科技公司，“光大”挂靠省文化厅。据他们调查，文化厅没有投一分钱，“光大”的原始资本又从哪来呢？

也有职工反映，亨通按市政府纪要应缴付国家的600万元原值和债务并未到位。为什么还能接收化工厂呢？

那位原厂的会计师说，他自己估算了一下，化工厂目前资产至少有1.2亿元，现在却压价2400万元卖给亨通，这岂不是国有资产的大流失吗？

笔者问他们：“据说明，亨通进厂也做了不少好事，比如发了一些工资等等？”

他们回答：“工资是发了一些，缓解了职工的某些困难。但是我们实行的是亨通对职工的安置承诺。亨通没有诚心，比如我们自动离职协议，安置工龄，一年才200元。一个工作几十年的老职工，拿个几千元便没有了‘家’又有什么用呢？！”

笔者又问道：“如果亨通被挤走，你们厂怎么办？不是又陷入以往的困境吗？”

这些职工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回答，企业破产本不是职工自愿的事情，是属于不规范破产，水分很大，只要改组管理上的一些弊病，不愁没有发展前途。“我们要求充分体现职工的权益保障，全体职工举手表决，或者搞股份合作制，或者联合别的有实力的单位，共同生产经营和开发。”

当谈到他们上访的经历时，一声“难呀”概括了一切，据他们讲，许多领导也能通情达理，给他们讲政策讲现实讲事实，可是也有个别领导的话却怪怪的。在一次对某局的上访中，一位女处长说道：“国家的企业，政府要管，给谁就给谁，一分钱不要也可以！”她还说一个国家的干部呢，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这几个职工实在想不通。”

临走时，他们叮嘱道：“你们一定要说真话！”并再三申明道：“我们并不是闹事的，我们只是想争回应有的权利，不许几亿元国有资产流入私人的腰包！”

笔者曾经到过省、市政府，就关于亨通公司和化工厂的事件，对有关部门进行了采访。

据省有关部门称，省化机厂自破产后职工生活陷入困境，先后也有几家单位愿意兼并收购省化机厂，但是由于职工期望值过高，对厂资产估算过高，要的价码太大，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联系了西安亨通公司，亨通公司的条件相当优惠，只是有些职工不理解，受传统观念影响，存有偏见，这是违背党的政策和十五大精神的。亨通公司接收化工厂法定手续齐全，至于职工反映的亨通公司法人注册用假名、国家干部非法经商、亨通公司性质以及未交钱就办了接收手续等问题，省上已叫西安市调查处理。

赵恒(又名赵鹏)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纪检部门则明确表示：如果其经商，则属违法行为，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令人沉思的结局

虎年年初，西安市亨通公司在化工厂上级主管机关冶金机电局直接干预下，进驻化工厂上马施政。原化工厂职工和西安市亨通公司的这场风波似乎该终结了。

1998年3月2日下午，笔者再次来到原省化工机械厂。昔日冷清的化工厂似乎多了些许生气，厂门口昔日喧闹的小摊贩已被亨通公司清除规整，并贴上了“乱摆摊，乱倒垃圾者，后果自负。”的标语；那一进厂门口就瞥见的两块职工“民主墙”，除了还残留着职工们抵制接收的片语只言的苍白痕迹，绝大部分早已被亨通公司的种种黄色“告示”压得无影无踪了。笔者详细地看了看亨通公司的告示：

第一个：凡是在厂门口、厂区内搭建违章建筑的一律拆除……第二个：企业破产后，由于无钱交加按揭费用，省电视台掐断了线路，致使职工的正常文娱活动不能进行。现在公司已联系妥当有了有关事宜，近期内可望开通。第三个：部分电路老化，公司决定派人修理……第四个：下列职工来公司报销医药费……其中有原厂长罗永祥的名单。

笔者来到了厂区内，只见车间大门紧闭，门口一大堆垃圾让人心情沉重。像这样的工厂，恢复生产，又要到何年何月呢？

遇到一些原化工厂职工，多数对这样的结果表示无能为力默许了，也有不少职工坚持认为亨通公司有鬼，自己“不跳火坑”，宁可一次性买断工龄，早早脱离亨通公司。

党的十五大以后，企业加快了改制和产权交易步伐，但是在全国各地的破产兼并收购过程中，却发生过多次职工反对破产兼并收购的事件，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据报载，西欧的一个社会团体为了了解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派出一个考察团来到了中国某个贫困县，考察团在县城宾馆中的一切却令他们产生了怀疑：县领导天天在宾馆内陪客人“宴”，几乎顿顿饭都要摆上十几桌，好烟好酒，大鱼大肉……特别是考察团接触过的县、乡级科局领导，个个来去都是小轿车。以至于一个考察团成员终于忍不住向县领导提出了疑问：“这个县真的像你们介绍的那样穷吗？”

实际上这个县的确实很穷，但在西方人的眼里，穷为什么还要天天摆宴？既然公职人员连工资都发不了，农民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养活那么多车干什么？精于算计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会“算帐”：一台车从购到养，什么税费、油费、维修费、保险费等等，一年下来，对于一个贫困地方来说，那是很大一笔开支呀！中国人真的像“洋人”认为的那样不会“算帐”吗？

“公”姓轿车泛滥之忧患

百家言

文/若竹

国内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小轿车的增多，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腐败奢侈的产物。拿一个县局级单位来说，全年工资经费不过3万元而已，扣除人头费发工资外，其余的资金连买辆纸、墨水都难以满足，可哪个县局还不养一台甚至两台车呢？且又有哪台车不是东奔西跑个不停呢？再问得深一点，这些跑的溜溜转的小车又有多少时间是用于工作呢？

公车花钱个人享受似乎早已不是令人脸红的问罪了，而变成了令人“眼红”的公开腐败，就如同公款旅游、公款装住宅电话、公款吃喝、公款的大哥大揣在私人腰里一样，小车的使用频率自然也是随着“一把手”的频繁进出而上升的：什么上班的摆摆，探亲探友的必备，接送子女上学，为七大姑八大姨办事，甚至下属单位送上“贡品”，装上“礼物”贿上司……至于那些天天忙得团团转的一般工作人员，即使有充足的公车理由是忙于公务，对不起，蹬上自行车去吧！

实际上，对某些掌权者来说，对小车的功能认识早已不是代步工具了，而是用来当作自己地位、权力、荣耀的一种象征。不信，你随便找一个农民问问，他肯定准确无误地指出那些“212”的，是什么人，那些“桑塔纳”的，是什么人，那些“奥迪”的，又是什么人……

“公”姓轿车泛滥的现象，不知是给社会带来了繁荣还是带来了贫穷？不知是经济欣欣向荣的表现，还是腐败滋生滋生的一个肿瘤？

只有23岁，一个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是多么多么的不易啊，……请代我向母亲转交500元钱，以表我这位母亲的心意。”

杨卓辉的妻子肖江丽哭着向记者介绍：卓辉是湖南娄底市白马镇学足村人，他3岁时父亲便因公殉职，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和另外两个兄弟拉扯大的。目前兄长残疾，母亲患白内障和严重风湿病。“他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面对悲痛万分的烈士妻子，莲花北村管理处负责人说：“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后，你们俩就是莲花村的女儿，你们的难处就是大家的难处。”

收钱队伍小姐像平常一样，将19500元营业款装入一个大信封，然后由二楼上三楼财务室交款。走到三楼拐弯处，忽然身后窜出一个人拦腰将她抱住，并捂住她的嘴。不好，遇到劫匪！挣扎中，她已被拖至旁边的配电室，钱袋从小伍身上滑落在地。

壮烈牺牲。而劫匪撒腿就跑，竟有百人哄抢。本月六日，深圳街头打工青年杨卓辉勇擒劫匪，助者寥寥。

事后，警方决定，凡参加哄抢赃款者，只要将所抢赃款主动悉数退还，可免除追究其法律责任。尽管这一决定刊登在各大媒体已经好几天，截至笔者发稿时止仍无主动退赃者出现。

此时，正在楼底搞装修的杨卓辉听到叫喊，看见一位高个头的男子正慌慌张张地向外跑出来。“往哪里跑！”他二话没说，立刻朝那人追去。李岗等与他一起做工的几位青年人也随后追了出来。劫匪逃至莲花路上，一边跑一边对追赶的杨卓辉说：“不关你的事，别多管闲事。”小杨斩钉截铁回答：“这样的闲事我管定了，你跑不掉的！”

经警方突击审讯证实，劫匪名叫杨生有，初中文化程度，原籍甘肃肃临夏。1971年7月生人。他1991年开始深圳，曾在皇家娱乐城作过电押解的张利兵听到车后乱哄哄的，停车回观，眼前却是一幅抢钱图：空中飞舞着大大小小的钞票，百十个人争相抢拾，你推我搡，乱作一团。王伟胜事后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0来个人围成一个直径约5米的圆圈，弓着背拼命抢；圈外的人不甘示弱，也奋力向里挤，有的甚至从里圈人手中夺钱。尽管我们一再向大家讲明这些钱是赃

工，熟悉娱乐城的情况，所以选择此处作案。目前他已被正式逮捕。

在福莲大厦人行道与莲花路交叉处，杨卓辉追上了劫匪，他一把将对方拦腰抱住。劫匪从身上抽出一把尖刀，凶凶地威胁说：“快放手，不然我杀死你！”小杨不怕，反而抱得更紧了。劫匪终于下了毒手，尖刀刺进了小杨的左前胸，染血的鲜血立即把小杨的衬衣染红了。踉跄了几步，他倒在了血泊

“深圳为你哭”

杨卓辉勇擒劫匪壮烈牺牲的消息，在深圳市和他的家乡湖南传开后，人们都为失去这样一个好青年而悲感。

深圳市益田村的萧老太太在电话里对报社记者说：她看了有关报道彻夜难眠，“杨卓辉

在特区这块特殊的土地上，真善美与假丑恶激烈较量着，甚至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促使人们的觉醒。深圳一家文化生活期刊以“深圳为你哭”为大标题报道此案。那么，该是哭英雄的悲壮？还是哭世人的麻木？是哭杨卓辉这样优秀青年的死，还是哭那些拾钱人不羞不臊的生？

“这回回来的是正宫”

马良/诗 双木/画

兄弟都把“嫂子”叫，“小蜜”就骂“不正经！”这回厂长带夫人，不冷落谁进舞厅，吃罢喝毕进舞厅，厂长回带“小蜜”，个个都像狐狸精，

“这回回来的是正宫！”



泪，该为谁而流？

世相百态

文/张松平

只有23岁，一个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是多么多么的不易啊，……请代我向母亲转交500元钱，以表我这位母亲的心意。”

杨卓辉的妻子肖江丽哭着向记者介绍：卓辉是湖南娄底市白马镇学足村人，他3岁时父亲便因公殉职，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和另外两个兄弟拉扯大的。目前兄长残疾，母亲患白内障和严重风湿病。“他是我们全家的顶梁柱，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面对悲痛万分的烈士妻子，莲花北村管理处负责人说：“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后，你们俩就是莲花村的女儿，你们的难处就是大家的难处。”

只有23岁，一个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是多么多么的不易啊，……请代我向母亲转交500元钱，以表我这位母亲的心意。”

只有23岁，一个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是多么多么的不易啊，……请代我向母亲转交500元钱，以表我这位母亲的心意。”

宴友思 头条新闻大赛

陕西工人报 SHAANXI GONGREN BAO

每周二、三、四、五出版 复字2154期 代号517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GN61 0015 1998年4月17日 星期五 今日4版

陕西名牌 陕西安康康源酒业有限公司